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面向 21 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研究”成果

课程

高孝传 杨宝山 刘明才 主编

目标研究

KECHENG MUBIAO YANJIU

教育科学出版社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面向 21 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研究”成果

课程

高孝传 杨宝山 刘明才 主编

目标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王 薇

责任印制 田德润

责任校对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课程目标研究 / 高孝传等主编.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7

ISBN 7-5041-2155-X

I. 课... II. 高... III. 课程-教学目的-研究

IV. G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880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2003339 传 真 6201380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241 千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印 数 00 001—5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顾 问	阎立钦	白月桥	
主 任	赵 峰		
副主任	高孝传		
委 员	朱培森	张云亭	刘明才
	冯新瑞		
主 编	高孝传	杨宝山	刘明才
编 辑	于俊廷	李 磊	陈永亮
	宋 刚	潘春丽	

42100/12

序 言

学校课程是社会时代的产物,反映社会历史的特点,并因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社会即将迈进 21 世纪。21 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科技化、多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在新世纪里,历史所形成的各国疆界依然存在,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科技、交通、资讯的高度发达,当今世界已形成了一个全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村。许多问题,诸如环境保护、资源分配、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区域冲突等,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变化急剧、充满着竞争与挑战、机遇与希望的世界。世界形势变了,教育的功能非变不可,学校课程必须进行改革。

自 20 世纪晚期以来,各国的教育和课程改革如火如荼。这次世界性改革的共同特点是:强调课程的人文化;力求课程的生活化;注重课程的统整化;加强课程的弹性化;大力开发校本课程;着重培养创造能力。为了达到这样的改革目标,当代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对现行的课程和教学实行大力变革,进行课程再设计,努力构建学校新文化,极力改革传统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评价观和学生观。

作为已经打破闭关锁国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自然不会忘记历史的教训,不再作世界教育改革的旁观者,而再次错过改革课程和教学的历史性机遇。所以,在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制定时,由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三方领导共同商议,承担了一个国家级重点课题,即“面向 21 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研究”。1997 年 6 月,本课题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了开题仪式,课题主持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阎立钦教授作了开题报告。报告中,阎立钦所长就当代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课题立项的意义、研究的方法途径、最后的科研成果等,逐一作了具体阐述。全国有 10 余个省市的教育行政单位、科研机构、大中小学校及其管理干部、专家学者和中小学教师等,参加了本课题的研究,承担了其中的部分研究项目。把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改革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动员如此庞大的队伍参与,这在我国教育科研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作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个单位,并且课程教材改革研究又是我们的本职业务,自然要参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在总课题设计方案的指导下,经过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全体同志讨论,并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其他承担研究任务的研究室协商,我们承担了总课题中的多项科研项目,其中主要是从整体上对课程教材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如何构建面向 21 世纪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型课程体系。

设计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课程体系,是一项艰巨的科研任务,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基本的课程学知识,要以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法规为指导。当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之中,1998年12月国家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指出:“当前,许多国家政府都把振兴教育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基本国策,这些动向预示未来教育将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应当及早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改革课程体系和评价制度,2000年初步形成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和课程标准,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行新的评价制度,开展教师培训,启动新课程的实验。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

1999年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面对新的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因此,必须“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改变课程过分强调学科体系、脱离时代和社会发展及学生实

际的状况。抓紧建立更新教学内容的机制,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重视实验课教学,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及其公布的重要文献,对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作了全新的阐释,拓展了素质教育的实施领域,构建了素质教育的运行机制,赋予了素质教育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我们构建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开展课程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我们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和课程教材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根据《行动计划》及《决定》所提出的改革指导原则,结合我们所承担的研究任务,参照当代世界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我们进一步调整并明确了课题研究任务。为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把我们承担的研究内容具体定为“中国基础教育素质教育课程体制的构建”。这里所说的“课程体制”的概念,是课程管理制度和课程体系合二为一的简称,其中的“体”是指体系结构,“制”是指课程管理制度。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即“面向 21 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研究”,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外延非常广泛的大型课题,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把我们所承担的有关课题的研究任务明确命名为“中国基础教育素质教育课程体制的构建”,则更便于研究、操作,更符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议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这是我国当代课程教材改革的重点、难点,体现了课程改革的时代性。

21 世纪是一个交通便捷、科技发达、社会高速变化、国际关系日益密切的知识经济为本的新时代。新世纪种种共同的社会危机或挑战,决定了世界各国教育和课程改革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例如,课程和教学改革的人文化、统整化、弹性化、个别化和生活化等,的确是跨国界的。

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由于各国发达程度不同、历史文化有差异、民族特点有别,以及国家间的利益矛盾等,决定了各国教育或课程改革的特殊性。所以每个国家在制定课程政策、确定改革目标、设计改革方案时,都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无不针对本国教育和课程存在的弊病确定改革目标。例如,在课程管理体制上,美国和英国向来实行地方分权,国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美国先后制定了各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英国则把英语、数学、科学、技术等定为“国家课程”,公立中小学必须开设。这两个国家都在研究解决地方分权与国家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相反,世界上那些实行中央集权课程体制的国家,如俄罗斯、法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也从本国的情况出发,不再坚持集权制,而是走向分权,向学校或地方下放管理课程的权利。

我国的台湾地区由于近 20 年来经济、科技、文化的高速发展,被称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为适应社会变迁,台湾对教育和课程进行了重大改革。从课程管理体制来看,台湾的课程也属于中央集权型,课程设计以分科课程为主。台湾于 1998 年 9 月公布了《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2000 年 3 月改为《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以此来取代长期使用的被批评为“条例式文件”的国民中小学课程标准,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重新建设。

台湾新制定的课程纲要,是在批判旧课程标准科目林立、知识零碎、规定巨细靡遗弊病的基础上制定的,其课程架构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一是 5 条指导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培养具备人本情怀、统整能力、民主素养、乡土与国际意识以及能进行终身学习的健全国民);二是 10 项课程目标;三是 10 大基本能力;四是 7 大学习领域;五是以学年为单位计算的 80% 的“基本教学节数”和 20% 的“弹性教学节数”。关于这个课程架构的具体内容,我们不能逐一分析,现仅谈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7 大学习领域”。

台湾课程学者认为,台湾国民中学的学生多时要学习 22 门学科,每周上 37 节课,只有 2 节体育课。而日本只有 11 科,每周只有 31 节课,每周 3 节体育课;欧美只有 9 科,几乎每天都有体育课。显然,台湾的分科课程设计,

脱离了时代,加重了学生负担。^①因此,台湾新课程纲要中的所谓“7大学习领域”,即把原国小11门和国中22门分科课程,整合为“语文、健康与体育、社会、艺术与人文、自然与科技、数学、综合活动”7类大的统整课程。

据设计者介绍,台湾新制定的九年一贯课程纲要,通过对知识的“再概念化”,对学校文化的重建和对课程的再设计,打破了旧科目的藩篱,加强了基础能力培养,给学校留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减轻了学生负担,吸纳了现代知识内容。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活泼乐观、合群互助、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创造进取”的精神。

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香港自1997年开始,对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进行了全面检讨,广泛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就如何建构面向21世纪的教育目标和课程教学,充分发表意见。“在整个检讨过程中,有激辩,也有疑虑;有盼望,也有控诉;有指责,也有感动。来自不同岗位、不同界别的朋友,各自付出了许多的时间和心血,将许多理想和热情投入了这次改革。”^②通过全面检讨,香港各界一致认为,香港作为中国杰出的城市、亚洲首要的大都会、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国际公认的金融商业中心,为适应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的根

① 曾宪政:《九年一贯课程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台湾《教育研究通讯》,1999年,1月。

②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统筹委员会:《教育制度检讨·改革方案(咨询文件)》,2000年5月,前言第4页。

本变化,必须相应地转变教育功能,重新设计“21 世纪教育蓝图”。在公众人士全面检讨的基础上,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拟定了适应新世纪的整体教育目标。其内容为:“让每个人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个性的发展,能够一生不断自学、思考、探索、创新和应变,有充分的自信、合群的精神,愿意为社会的繁荣、进步、自由和民主不断努力,为国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贡献。”而培养学生“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新”,则是 21 世纪整体教育目标体系中应首要达到的核心目标。

为贯彻新制定的教育目标,实现 21 世纪的教育蓝图,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提出要通过建立学校“教学新文化观”,推进课程改革,真正改变学校生活面貌。香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方法策略是:(1)从强调知识的灌输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如何“学会学习”;(2)从偏重学术课程转变为多元化的全人发展课程;(3)从固有的科目框框转变为推行整合性的学习;(4)从以课本为主导的学习模式转变为采用多元化的教材;(5)社会支援教育、教学走出课堂;(6)从学校传统的上课时间表观念,转变为综合而富弹性地编排学习时间;(7)取消过早分流,为学生提供了解并发展自己的性向和潜能的机会。

在这样的改革策略下,香港学校课程和教学将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为了实现从固有的科目框框转变为整合性学习的改革策略,香港拟定把原先的分科课程统整为“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科学、科技、个人社会及人文、艺术、体育”8 大学习范畴,对传统的分科课程进行根

本性改革。香港力图通过这样的改革,构建一个符合终身学习社会所需要的课程和教学的新架构,以“保证基本水平,鼓励追求卓越”,使学生获得新世纪必须的基本态度、能力和知识,奠定终身学习的基础。

当今世界各国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无一不是以全球的视野,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迎接新世纪的全方位挑战,重新设计课程框架。这是改革的共性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各国和各地区的改革,又无一不是从本国和本地的实际出发,具有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即使同一个国家也会有区域的差异。因此,中国课程教学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方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自周秦以来,便是各民族聚居的国家,香港、台湾及大陆上的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流着相同的血液。所谓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命题,当然要包括台湾和香港,而台湾和香港的改革,自然与大陆有共同之点,而且也必然有区别之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实施考试制度的国家,被世人称为考试的故乡。“望子成龙”不仅是大陆而且是香港和台湾孩子家长的共同心愿。悬梁刺股、穿壁引光、积雪囊萤、燃糠自照等历史故事,不仅在大陆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在港、台同胞间同样有传诵。中国封建时代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中彻底清除。^①这就是大陆“应试教育”、台湾“考试领导教学”、香港“筛选精英”的共同历史根源。而且,中国的义务教育不论在台湾、香港,还是在大陆,其开始的时间和实施年限,都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是造成我国课程和教学改革滞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义务教育是推动一个国家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强大动力。近现代教育发展史已证明,凡是实施义务教育时间早和年限长的国家,课程和教学改革就会在世界领先,否则就必然滞后。

以上这些根源,决定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教育制度和课程体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某些通病:①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课程管理政策,地方和学校及教师缺乏课程自主权力;②英才教育价值取向占主导地位,过分强调课程和教学的选拔和筛选的功能;③课程体系设计偏重学术取向,教学科目林立,知识掌握零碎;④教学内容陈旧,难以及时更新,脱离学生发展和社会需要实际;⑤教学过程过分重视接收学习和机械记忆,学生缺乏主动参与和探究发现。

这些弊病,也许有人认为,似乎仅是对大陆课程和教学弊端的概括,而香港和台湾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不然。例如香港,尽管香港被英国割占 150 余年,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回归前香港的教育完全由英国人主宰。虽如此,但香港的课程体制基本上是中国大陆血

① 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2000 年 2 月 1 日。

统的。对此香港的课程学者有过论述。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原院长莫理士曾分析说:一直以来,香港奉行的课程发展模式,是属于“权力压制式”。由中央决定的课程纲要,学校和教师休想越雷池半步。学校和教师在课程发展的整个程序上,只是一个被动和接受的角色,可说是完全没有地位。^①

至于以上我们所列举的其他诸条弊病,港、台的课程学者及其论著,也都有过详细论述,我们不再逐一列举。

其实,中国课程与教学的弊病,也不是中国所独有。曾受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教育思想影响的某些东方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存在着这样的弊病。这些弊病扭曲了基础教育的本质,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思维,不符合 21 世纪创新教育的课程目标。为克服这些弊病,亚洲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台湾和香港近几年来通过对课程的整体检视、深刻反思,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改革。通过这次改革,淘汰过时的“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三合一教学”,取而代之的将是讲解、阅读、观察、实践、个案研究、专题讨论、媒体欣赏等教材品种多样、课内外并举的教学方式,^②着重培养学生的“勇于承担、敢于创新”的精神。

当我们说到中国教育弊病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

① 黄显华主编:《强迫普及学校教育·制度与课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② 张德锐:“从九年一贯课程改革谈师资培育机构因应策略”,台湾《教育研究通讯》,1999年1月。

些弊病是和西方国家比较而言的。但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学生刻苦勤奋好学,基础知识扎实,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应当继承的优点。中国课程和教学的改革要在继承优点、克服弊端的基础上,学习西方重视培养能力和发展个性的长处。在此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创新能力二者的辩证关系,通过科研确定知识掌握的合理度,不能极端化。

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研究”的子项目——“中国基础教育素质教育课程体制的构建”,该课题的研究,为了能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需要设计新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课程体制。新的课程体制的设计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我们说,“中国基础教育素质教育课程体制的构建”这一研究题目的确定,既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又能回应当代世界发展形势对我国课程和教学的全面挑战。

这是因为,其一,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民的素质还不高,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与历史时代不相符的陈规陋习,甚至违法乱纪行为。“譬如贪污腐败,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经营活动中的坑蒙拐骗,社会生活中的

偷盗扒窃,还有种种刑事犯罪,卖淫嫖娼和拐卖妇女儿童,等等,这些活动相当猖狂,这些现象不能不是国民素质还不够高的一种反映。”^①其二,就我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而言,我国现有科技工作者大致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②我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资源、技术和设备问题,而是12亿多人口的素质问题。

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各国间的激烈竞争归根结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所以我国进行教育和课程改革必须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关系到我国在新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赢得主动权的关键问题。从这方面来看,确定“中国基础教育素质教育课程体制的构建”这一课题,不仅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了时代要求,而且使“面向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研究”这个大型课题的内涵,更加确切、具体和便于操作。

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一次深刻的教育革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又围绕这一核心课题组织全国一些省市的有关单位和人员,相互合作,拟定了多个子项目,经过几年努

① 柳斌著:《柳斌谈素质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② 白月桥 蒋志峰著:《素质教育与脑功能开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